

清季變局中士紳的地位、角色與權勢研析

徐亞萍

銘傳大學應中系副教授

摘 要

隨著十九世紀歐美工商的發展，啟動了世界歷史的巨輪快速轉變，東方古老的中國亦無以自外倖免。泰西先進諸國，無不傾其穎異的創新知能、技藝發明之雄厚實力，強要通商，甚至兵橫相向，以遂其殖民搶佔的野心。時當晚清，國家歷史動向亦被迫遷變，這便是清季的變局。

同是四民之首的士紳階層，思想家以獨具的敏覺，掌握世界大勢，察識應變，提出讜論箴言；然諷刺小說中卻反映另類士紳藉勢藉端、喪德敗行等背離社會期待的行止，呈現對比反差的社會現象。本文擬從政治層面的文化、心理的角度及文史互証的方法，探究清季士紳地方權威勢力形成的深層因素及其影響。

關鍵詞：清季、變局、士紳、知識分子

People of Wisdom with the Power of Local Authorities Forming and Effects In an Unsteady Era of Late Ching Dynasty

Ya-Ping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it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western world started the giant wheel of world history speedily which impacted ancient China. Western countries with their powerful advance technology and inventive skills forced China to do business with them and even waged the cruel wars to fulfill their colonial ambitions. It's late Ching Dynasty and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was forced to change. It's so call the late Ching Dynasty Transition.

People of wisdom, thinkers of the time,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social ranks, peculiar sense and outstanding thoughts, not only they absorbed the accommodating experience and wisdom, but also they grasped precisely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nd gave outspoken statements and admonitions. Nevertheless, the satire literature reflected the other sort of people of wisdom who had immorality and misconduct against the social expectation and conduct. Both of them reflected the contrast of social phenomenon. Herewith, we discuss the forming and effects of the people of wisdom with the power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late Ching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teractive comparison.

Key words: Ching Dynasty, Transition, People of wisdom, Intellectuals

壹、前言

中國素以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著稱於世，無論是書寫的歷史抑或是客觀的歷史，既綿延不斷，也深受歷代讀書人的重視。若將「歷史」理解為時間、空間的流變下，人物的行事設施則隨之而變的客觀事實，準此，也無怪乎當年孔子曾說：「逝者如斯，不捨晝夜」即或是緣於偶然片刻佇足的觀照中，油然而發的人生喟嘆；然而，感慨之餘，也同時有另一份對歷史結局所包孕的理性感悟，並終究以「行健不息」，挺立了主體精神與深自期許。此種既不昧於人世真貌的務實，又能自我提升與超越，當然是最佳的人生典範。

事實上，古往今來多少人、事、物皆必然的沒入歷史長河之中，對此悲劇性的定然，雖不免有無可奈何的傷感；然而，記取前言往行，自可減卻部分人世的遺憾，這也是正得失、知興替的歷史真諦之所在。此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史觀與史感的表現，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各類典籍的重要內容之一。即便以文學作品中的詩歌發展為例：《詩經》、《楚辭》分別是中國最早北方與南方詩歌之總集，其中〈生民〉、〈公劉〉、〈綿〉以及〈九歌〉、〈離騷〉、〈天問〉等篇章，即載錄著先民生存奮鬥的史事，也蘊含了進步的歷史觀念。詩、騷之外，歷經兩漢、魏晉……以迄今，幾乎代代皆有融史入文的作品。此中透露的訊息，至少可從兩個方面觀察：其一是歷史本身賦予人類警惕與啟示；其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文人士子已習慣性的將史觀或史感融入作品之中。文學領域的作品尚且如此，更遑論史學範疇之作品。

故在文化傳統的陶養下，歷代士人常以著書立言勵行生活道德的實踐，以達成己、成人的理想。清季知識分子中思想家、小說家也不例外，各在專注的領域耕耘，以期喚醒國魂，齊力因應，救亡圖存的心念是相同的。其中，小說家在人心思變、思潮動盪、新知輸入、出版發達的因素影響下，帶動諷刺小說的創作風潮，內容中尤以諷刺官場仕宦陋行的為最多，為此，即出現了士紳形象反差的現象及問題。為深入索解士紳形象反差的原委，本文依次就清季變局的肇因、士紳著論立言察識、因應的理想典型，以對照、凸顯小說所反映士紳形象反差的現象，最後就士紳型塑過程中，地位角色變遷及權威勢力高漲的影響為結。

貳、清季的變局與知識分子（士紳）的察識

西方經產業革命而改變了生產方式，更大幅提升了國力，為攫取原料、推銷

產品，挾其富強優勢侵凌他國；相對的，中國的境遇，則在西方列強工商勢力步步侵逼下，節節敗退，國勢日衰。俄國以橫越西伯利亞東進，英、法等國航海東來，確實是十九世紀列強對中國侵略加劇的張本。歷經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的鴉片戰爭，竟打破了中國孤立的防線，使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日益增加，同時，「中西接觸」開始愈發頻繁。

西方器物及天文、地理、數學等先進知識大量輸入中國，朝野人士所見所聞，為亙古以來所未曾體驗，一切今非昔比。無怪研究中國近代歷史學者，皆指出「中西接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關鍵（王爾敏 1995，1），並歸納近代中國的特性有三：一是中西接觸頻繁，使中國由亞洲的中國變為世界的中國；二是中國認清傳統文化的不足，於西藝、西政、西學大力講求，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大量移植到中國；三是中國屢次被外國戰敗，又屢次整頓振起，故中國近代的歷史是挑戰與應變、屈辱與自強的交替過程，同時也是從孤立於國際舞台之外的國家，變為世局安危的中心（張玉法 1989）。總體言之，此三方面所彰顯的近代中國，正處於歷史的巨變。本文即以鴉片戰爭之後，中西衝突紛乘，戰爭與交涉，仇視與疑懼日亟的階段，視為近代的主體，也正是「清季」所指稱的時期。以下就清季的變局，及當時知識分子的察識，探討說明之。

一、清季的變局

影響清朝局勢變遷的重大關鍵，在於清廷政權的運作及中西接觸的發展。就前者而言，自滿清入主中國之後，就以高壓懷柔恩威並濟兩手策略，快速征服統治了中國，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內鞏固皇權統治，對外降服鄰近諸國，百年間開疆拓土，使十七、八世紀之中國能雄峙東方，聲威遠播。

至於中西接觸，係緣於早期西方人為傳教、通商之目的，唯俄國人沿西伯利亞東進，則懷有侵占領土野心。中西海、陸交通之開闢：陸路大關於元代，三次西征，經中亞到西歐，最遠至現今義大利、德國；海路則關於明代，鄭和七次西航，最遠達非洲東岸。俟後因土耳其崛起於中亞而陸路受阻；海上交通則因歐人繞經好望角，發現新航道而益盛，成為中西往來的主要通道。

交通開闢，西人東來傳教、通商皆便利頗多。西方教士以介紹西學為傳教之方，並廣為結好中國知識分子，西學因而得以輸入中國，如天文曆法、地理學及製造火礮技術等，而教士的譯書、著書影響甚大，對中國近代科學及知識的啟迪良多。

十九世紀以來世界的歷史發展，形成以工商為主軸的新動向，衡量文明進步及國家強盛的指標也隨之改變，已不在於文化悠久與否，而視其工商發達、迅速，

軍事設施、器械之優良而言。所謂落後國家，是指其工商業不發達，生產力遲滯落後，而不在其古文明歷史悠遠如當時印度、波斯、埃及。此一歐美列強所領導的世界新趨勢，在清季之中國初始接觸之際，就成為聞所未聞的新遭遇，尚有待當時知識分子的察識與因應。

滿清康、雍、乾三朝勵精圖治，國基鞏固，既聲威遠播，雄峙東方，自然也承續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天朝觀」，是以天下即中國、即世界，認知中並無西方所謂主權國家之觀念，僅作文明與野蠻之分，因此長久以來對外基本政策乃是「撫近以禮、懷遠以德」。此種「天朝自居」的世界觀，視外國為夷狄、藩屬，根本不解西方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物質進步，卻堅持閉關自守，以致對世界情勢一無所知。此種對外態度及方式，在中國國力強大、聲威遠播，及西方各國對中國狀況不甚瞭解之時，中、西尚能相安無事；唯滿清政權由盛轉衰，甚至嘉慶、道光朝，漸失統治力，又適逢歐美強國以工商勢力侵襲亞非之狂瀾洶湧之際，遂致中國內憂外患，交相迭乘。如道光年間，外有鴉片戰爭的爆發，內有太平軍的起兵；咸豐一朝，又有兩次英法聯軍的侵凌；同治時期，西北、西南回亂交盪不已，尤其日本明治天皇之維新，多方學習西洋，國力大幅提昇後，竟於一八九四年對中國宣戰，此即中日「甲午戰爭」。昔日天朝中國眼中的小日本，不到八個月，完全吞併遼東；海上戰況同樣窘迫，將帥喪亡，船艦沉沒，中國北洋海軍從此敗亡。由於對日戰爭慘敗，也全面促醒中國之驚懼。

甲午戰後，邊藩盡失，列強要求租借港灣、築路、開礦及競相劃定勢力範圍，幾有瓜分中國之態勢，而瓜分危機的造成，正是列強勢力經年累月入侵中國的結果，凡此更給予中國朝野極大刺激。在東、西洋武力及經濟雙重衝擊之下，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國家經濟瀕臨破產，民族生存面臨絕滅。此即中國數千年以來沉浸於天朝美夢，終被西方列強之船堅礮利衝擊下驚醒，所面臨的，正是清季知識分子口中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鴉片戰爭恰好是象徵性的開端。此後，中西接觸頻繁，西方對中國之侵凌、壓迫以排山倒海之勢紛至沓來；中國史家省察此段中外關係，視為不平等條約時代，就中華民族之歷史遭遇而言，實為開天闢地以來所未經見之巨大「變局」。

二、知識分子（士紳）的察識

（一）士、士紳與知識分子

「士」原是古代對讀書人的通稱，而「仕」則指做官的讀書人。但根據王爾敏的研究，「知識分子」一詞乃是近代後起的，且至今其意涵仍在發展之中，故不易為之作確切的界說，只在論述的必要時，做相關指稱的描述性說明；他曾就

知識分子的由來及特性歸納為四點：

第一，沒有政治傳統的階級性，而是在個人憑藉各項有利發展條件下，成為社會領導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卻限於正統的知識灌輸。第三，是傳統職性分類中的士，即傳統社會中四民之一。第四，對於身份立場，能自覺地自我認知，亦即在行為特徵上能自我要求：其一，有開拓並延續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謂「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二，有擔負國家政治的責任和過問政治的興趣。所謂「學而優則仕」。其三，有謀致全民幸福樂利的抱負，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四，有悲天憫人之情懷，淑世之熱腸，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如此這般的學識修養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王爾敏 1995，97）。

至於士紳（或稱紳士），是由士與紳構成的一個社會群體。前者包括舉貢生監，處於權力的邊緣，既不屬於統治階層，也不屬於被統治階層，是一個中介群體，或說是一個「潛在的統治階層」；至於「紳」，包括現任官、退任官、罷免官及捐銜者（羅志田 2005）。

檢視學界對明、清的士、士紳、知識分子的相關考察，似乎都指向在中國歷史脈絡中，因政局移異、社會變動及制度更革等多面向發展過程的匯集之下，有一大致趨勢：即時至晚清，傳統士大夫有漸向知識分子轉化的傾向，尤其科舉廢止前後的過渡時代，知識分子在心態、思想上及行為上常有矛盾、浮動並從社會重心日漸邊緣化的現象（羅志田 2005）。

因此，士、士紳及知識分子三詞的指稱對象既有重疊、相參差的事實，無怪乎學者羅志田要指出士向知識分子轉化的過渡時代，「讀書人」正是其共同點（羅志田 2005）。為免於陷入定義的困境及認知的差距，本文所言及的士、士紳及知識分子，所指稱的對象是清季變局中的部分讀書人。

（二）知識分子（士紳）的察識

清末西方勢力大舉入侵，傳統中國的制度、秩序難以維繫，政權日漸衰頹，各方面問題叢生，舉國力求肆應，但又行之無效的危難困厄之時，知識分子眼見國家由昔日的雄峙東方轉而為列強瓜分，一代的盛衰興亡再次真實的徧歷。知識分子自幼成長中經典學習、禮教薰陶內化成生活的自律，所謂「內聖外王」，向歷史典範人物的學習期待及借鑑歷史、以史為鏡的警惕，於是，不論對古人過往種種之觀察，或在當下生活中，觀察人世、體悟人生並策勵未來，此種深重的歷史觀是源自每一個中國讀書人內心的歷史精神所使然。

清季的讀書人、知識分子面臨沉重的時代變局，談政事、論人性、以史為例等，一如孔、孟以降之儒者。錢穆先生曾以《孟子·盡心上》一段孟子之言談，做剴切的詮釋、剖析，頗為貼近知識分子的真實內在：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所經過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卻是神而莫測。歷史上一切經過都化了，有的沒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還要化，這個化便孕育了將來。過去、現在、未來一切都在化，卻又一切存在，所以說是神。要能從過去透達到現在。這才是有生命的過去，要從現在透達到將來，才算是有生命的現在。這才可說它有歷史的精神。」（錢穆 1980）；誠然，有了這種精神，才能形成歷史，清季的知識分子，當然體認到，自我雖是歷史之過客，既可道德充滿有如聖賢的理想與擔當，化現為「感時憂國」的大我之愛；也可為人世喪亂的滄桑之感；個人際遇的得失之念，但天命、天命靡常，人生促迫的無奈之憾……等，便是清季知識分子伴隨歷史感而生的憂患意識。清季知識分子便在此憂患之感的促迫下，生發出道德責任感，以自覺地對時代變局作察識。

事實上，那時知識分子對身處之變局，皆有相當的醒覺，而以著書立說的方式實踐生命的責任，將察識所得歸納變局的方向及現象，約有三方面：一是器物知能，西方的船堅礮利、機械器用、域外地理知識、天文算學等皆是西方傳來的新知能，且是洋人的優長，如不迎頭趕上，何以制服洋人？二是中外關係，昔日深閉固拒的態度，已不能遂行隔絕中西接觸的意願，更不能阻止西方的衝擊，中國門戶終究被迫、被動地逐漸開啟，承受對外往來。三是觀念、制度方面，如天演進化論、人權天賦、自由平等學說、議會民主制度、法律、商業、外交……等，皆是當日知識分子聞所未聞的新變。

正由於能察識、認清變局的嚴重，而後才會設想適應變局的方法。此外，對於中國所處之環境正是「變局」的發現，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已成為先知先覺之士議論中一項重要前提，同時，此項前提也是這些人的「共同認識」：即不約而同的認為中國正面臨數千年來一個巨大的變局，在中國歷史上，將產生一個從所未見的創新機運。根據王爾敏先生之歸納統計，自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〇年間，申述當前變局之意旨者不下三十七人，如最早的黃恩彤，認為道光年間中國已面臨數百年來大變局。同治年間，丁日昌認為中西接觸之擴大是千載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認為西人之東來侵略，是三千年來大變局，王韜認為是四千年來大變局。光緒年間曾紀澤、張之洞也都分別指出是中國自上古以迄當代前所未經見的變局（王爾敏 1995，386-408）。

從最早的黃恩彤、丁日昌至李鴻章、王韜乃至曾紀澤、張之洞等，這些清季的知識分子論及身處之變局時，所謂數百年來、千載未有、三千年來、四千年來，

或逕指自上古以迄當代……，雖各有指稱時間的長短，但那無非是一種歷史的回顧與概括性的認識描述。他們不但關心時變，且細察、分析變局之內容；追索變局產生之原因；歸納解釋變局之意義等，在在彰顯了清季知識分子能從歷史認識的角度去思考理解外，也呈現了相關卻不同層面值得深思的問題有三：其一是清季知識分子基於何種條件或因素能從歷史認識的視角去理解時局；其二他們的歷史認識有何特徵；其三彼等如何詮釋所認識的歷史變局的內容，提出何種因應及預示未來的方向。

有關第一、二項問題的思考，個人曾先後經〈清季知識分子察變、應變之群體意識〉及〈康有為之變異思想〉兩篇文章之探討論證，得知清季知識分子基於中國人性格因素及文化心理意識的因素；換言之，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性格中，有著尊重傳統及權威的價值取向；其表現特徵之一即是「尊重過去的知識和經驗」，所以服膺舊有的知識、學問。從歷史經驗中借鑑，似乎已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共有的性格傾向。至於文化心理意識的因素，即隨著歷史層累所形成的察變、釋變的概念及方式，長期積澱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中，而蘊藏隱存著考察世變的特徵。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就在生活的教養，及知識的習得過程，自然地消融在個己的心靈意識之內，成為生命成長及人生際遇中，照察自然大化的運行、社會人事的更迭，乃至世局時勢的變遷，能有所敏覺的心理基礎。其次，清季知識分子對當時變局的歷史認識，最重要的特徵在於是一種「群體意識」¹，換言之，他們的歷史認識是帶有不約而同的一致性及共同性的，故亦可謂為清季知識分子（士紳）察變、釋變的群體意識。至於如何詮釋所認識的歷史變局的內容，提出的因應及預示未來的方向等問題，思想家及小說家的著書立言，作為當時變局察識、因應的理想典型。

參、清季小說中士紳地方的形象

上述析論過程裡，已稍事說明在近代變局之中，醒覺識變的士紳們，藉著書立言提出因應變局的觀念辦法，以實踐為國盡忠孝的人生理想。儘管此種力行作為，有些可能僅止於書生論政，紙上陳議；有些則巧遇機緣，得近層峯，而能將建言化為國家政策，對紓解乃至扭轉國家的外交困境，發揮了實際的功效。如馬建忠於《適可齋紀言》之中，引進西方新論提出外交上的「均勢主義」，即借與西方來中國的各國，分別訂定聯合結盟的策略，使來犯的西方各國，彼此勢力相

¹ 同註 1，群體意識之意涵有兩方面：一是群體共有的認識；另一則是對「群體」的認識，此處指前者。

互制衡與牽制，進而能達致維護自己國家安全、生存的目的。

唯適因中西接觸日益頻繁，西方以其新穎知識、制度、器械、技能……等優勢，竟無止境地貪狠攫取中國資源的態勢下，有如侵逼、迫亡的另類戰爭，正逐漸形成鋪天蓋地的人禍，罩臨中國之際，那些先知先覺的士紳，苦心孤詣為國為民奔走勞頓、拯危扶傾尚嫌不足、不及之刻，卻也有不少散居各地方的士紳，竟膽敢無所不用其極的招權納賄、勾串鄉里官宦、大族，仗勢欺壓、貪墨營私、枉法亂紀等種種的敗德醜行，也日漸蔓延充斥在各地村里、市井。如文學作品也是某種程度反映時代、社會的面貌，則吾人或可試從三個不同創作時間及作者的小說作品之中，所描述的地方士紳某些借勢借端的劣跡，藉以佐證近代中國遭逢變局之中，地方士紳如何挾其權威勢力魚肉欺壓、枉法敗德的陋行，如《紅樓夢》第四回所敘：

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卻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買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求大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大恩不盡！」

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便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旁立著一個門子，使眼色不叫他發籤。……。

雨村道：「方才何故不另發籤？」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道：「何為『護官符』？」……。

這是慘遭革職在鄉的賈雨村，透過層層人情請託，終能渥蒙襲官榮國公之次子賈政的幫襯援引下，得授應天府。他於復職赴任首日，即遇亟需處理延宕年餘的凶殺懸案，衙中門役，好意提醒：莫急發籤拘提，要依「護官符」為考量判案的準據，方可達護官、保命的宏效。

原來「護官符」乃當時各省地方官必有的一個，寫上當地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族、名宦、鄉紳名姓的私單。列名之人，既為權勢、富貴兼具，甚至因門當戶對而聯姻結親，平日交誼往還之間，相互照應、扶持遮飾，早已形成地方上不容小覷的勢力，故而地方官府處事、判案總礙著情分臉面的考慮，否則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連鎖效應，豈能不顧？況且此情已非單一個案，而是《紅樓夢》中所謂：「凡作地方官者」、「各省皆是」的普遍官場文化現象了。

其次，如王韜，一生雖未踏入官場，然懷抱經世與報國之心，面對家國危局，勇於提出建言。他晚年作品《淞濱瑣話》成書於 1890 至 1893 之間，其中〈因循島〉一篇，虛構獵戶項某遇海難，漂流至因循島之簡鄉，隨一老叟回家後，為之述介島上省吏、郡守、邑宰皆為狼類，貪噬百姓膏脂；島主卻為諸狼欺矇。次日，項某不告而別之後，歷經被抓又幸得太守侯冠搭救，並受推薦任縣令幕客，在官宴之上目睹數狼化為人形、著官服共食肥人之景，及縣令受賄助邑紳迫害百姓、奪人田產；又為逢迎巡按大人，竟使愛妾、幼女伴寢，以謀宦途晉升，而後項某不願滯留島上，攜帶侯冠搜刮之珍寶，與海客同船返鄉的一段奇遇。今略舉其中一節為例，以證說王韜將所觀察當日官宦為官之道及其劣行：

今日為政之道，尙言情理耶？吾輩辛苦鑽營，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無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於一心，酬應通乎百變。上以為可，雖民無日之留，而朝有荐章之人矣。上以為不可，則民樂敦龐之化，朝吳頌德之碑。國舍有甘棠，不及私門有幸草也。

上述引文乃縣令協助邑紳強奪鄰田時，已知邑紳之子位居要職，因而逼死地主，並與邑紳商議對策，以免法律制裁。雖項某質疑，他卻毫無愧色的竟言：「民命能值幾何？以勢制之，彼亦無能為力。」顯見縣令之所以協助奪民田產，是因既畏懼所謂地方士紳的威權勢力，且另有所圖的攀附居高位的邑紳之子，冀望他日能有晉升的機會，無怪乎「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無德政」，是其為官之道。²

再次是舉李伯元的代表作《官場現形記》，這部小說於 1903 至 1905 全書完成，十足豁現了官場現實的窳敗，所描繪陰冷生活的面向予讀者印象深刻，無怪乎小說一問世即風行全國，論者以為寫得最成功的這部小說不僅給官場「現形」，更深層的是揭示士宦階層的醜惡靈魂。

茲舉《官場現形記·原序》之中，茂苑惜秋生表達了至為沈痛的感懷（張素貞 1984，2）：

天下可惡者，莫若盜賊；然盜賊處暫而官處常；天下可恨者，莫若仇讎；然仇讎在明而官在暗；吾不知設官分職之始，亦嘗計及乎此耶？抑官之性有異於人之性，故有以致於此耶？國衰而官強，國貧而官富；

² 由於晚清科舉考試的不適時潮，捐納制度的浮濫，以及做官只為錢這些觀念的影響，致使當時的官場成為社會中最齷齪惡濁的所在。不少論者常從「千里做官只為財」的個人心理動機，來解釋晚清吏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賴芳伶 1994，218；鍾越娜 1977，38-39）。

孝，弟，忠，信之舊，敗於官之手；禮，義，廉，恥之遺，壞於官之手；而官之所以為人詬病，為人輕蔑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難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作者吳趸人，也同樣有類似的觀察，而在作品中藉九死一生之口說（賴芳伶 1994，220）：

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才可以求得差使；只要把良心攔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弄得著錢。這兩件事，我都辦不到的，怎麼好做官？

此外，更有欽差大臣奉旨至地方查察，以昭明冤屈、整飭吏治，但欽差表面雷厲風行，暗地裡卻守著為官的訣竅：「只拉弓，不放箭」的表面虛應故事的作為，讓仕齡淺者見著擔心害怕，就算歷練慣的人卻也毫不在意；為此，《官場現形記》十八回，一位內廷老公如此說：

現在還有難辦的事情嗎？佛爺（按：指慈禧）早有話：「通天底下十八省，那來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說，我也裝做糊塗罷了；就是御史參過，派了大臣查過，辦掉幾個人，還不是這們一件事；前者已去，後者又來，真正能殼懲一儆百嗎？」這纔叫明鑒萬里呢！

可見近代的官宦，從朝廷中央到地方基層，似乎都明白參劾的案子，就如小說所反映的：「其實也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現在的事情，無一論那一樁那一件，不是上瞞下，就是下瞞上。幾時見查辦參案，有壞掉一大票的？……不過其中，也總得有一兩個當災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³。所以，任何事情皆可通過門生關係、鄉誼之情……找到賄賂的途徑，何況「京城裡面，甚麼軍機處，內閣六部，還有裡頭老公們，那一處不要錢孝敬？」⁴再怎麼「廷寄查辦，還不是照例文章」⁵，弄到後來，無非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大概的洗刷一個乾乾淨淨，再把官小的，壞上一兩個。」⁶所謂「凡百事情，都是官小的誨氣」罷了。而那些被

³ 此為李伯元在其代表作《官場現形記》的第三十三回，頁 491 所描述的，詳見廣雅版（賴芳伶 1994，220-221）。

⁴ 同前註的第二十八回，頁 407 所描述的。

⁵ 同註 5 的第二十八回，頁 410 所描述的。

⁶ 同註 5 的第三十三回，頁 499 所描述的。

參的人，又私底下託人到京裡打點，而天大之事就如此瓦解冰銷。這些仕途司空見慣的事實，正是小說裡說的「中國官場辦事，一向大頭小尾慣的」⁷現象。

以上所舉無論《紅樓夢》、《淞濱瑣話》、《官場現形記》，也僅只是略為代表晚清小說中，對上述官宦、士紳的種種醜行所作的強烈諷諭而已，為此也難怪晚清社會流行著名為〈一剪梅〉的詞作，很能豁現官場實況：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朧，議也無庸，駁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亨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后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透過以上小說作品中諷諭官場的各個實例，不禁啟人思省、索解以下若干問題：

首先，為國盡忠、為家盡孝，何以是衡量並期許士人的標準？而士紳既有道德、責任、歷史、官宦的理想取向特質，故近代士紳於時事變局中，有積極著述立言，奔走國事者，又何以有不少地方士紳卻自甘墮落敗德傷俗，不僅辜負家國期待更遑論盡忠孝，且與士紳之護國佑民者相去懸殊，其中是否有深層肇因？其次，近代地方管控機制運行，與士紳地位角色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又為何地方士紳權威高漲及勢力擴大，已至胡作非為，驚世駭俗之極，是可謂治理已至制度失效、官宦失能的頹境。

為此，為析論上項相關問題，似可歸為關乎主觀內隱的自律及客觀外顯的他律兩大方向去思考、索解，同時也正是學者們所指陳的，是中國歷史傳統中的文化特殊設計，為釐清詰問，僅以中國人的家族背景中，就關切士紳培成的基源部分略為探討，再及中國近代地方管控運作大要及制度失效、官宦失能的主因簡要陳析如後。

肆、士紳長養的文化系絡

在封建制度下，傳統中國社會結構是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其內在所蘊含的兩大社會內容是：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及依社會分工而有的職業劃分。同時，也因有職業劃分而形成社會階層，即每個成員在社會中有其尊卑、貴賤、貧富有別的社會位置。且因經濟、政治情況所形成的差別，則再分為不同的等級，

⁷ 同註5。

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下法制訂定的社會特徵之一，即人們的社會關係地位是有嚴格的身份等級結構的劃分表現。而士、農、工、商的四民結構劃分，也就自然形成有序及分工的社會意義。但是，其中「士」這一階層，在古代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深植不移的觀念及「重農抑商、農本商末」的基本政策下，於是「士紳」階層無疑的，是享有獨特、穩定的社會地位，也為人習稱「四民之首」、「一鄉領袖」，此種情況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是代代相沿的，即使大清是以異族（滿、女真）入主中國，由於漢化至深，所以許多方面，仍承續明代舊制。為此，在清代封建法制認可下，「士紳」階層在社會結構中，仍獨享其獨特地位，即令在清代變局的社會環境，不僅不變其崇隆獨享的權威地位，且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換言之，中國社會在長時歷史治亂演變的過程中，儘管有政治、經濟、民族等各種衝擊、動盪，至多也只改變某些階層中特殊群體或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對於整體中國的社會結構，卻難以撼動，始終維持著四民分工、有序的組成模式。

根據前輩學者的相關研究，不約而同的皆指陳，社會上獨尊士紳階層的形成，乃是中國自古以來特殊的文化設計（韋政通 2000，48），更進一層而言，即是在封建社會文化中，價值取向的生活裡所形成的「士紳階層」；不僅有其「社會地位」，而且也有其一定的「社會角色」。

本文主題既擬探究士紳的權威勢力，在清代地方基層是如何形成的，勢必應先理解士紳的社會生活根源—家族的背景，以及士紳的家族生活教養所形塑的特質與傾向；亦即由家族培成，進入社會乃至國家的機制，當士紳面臨各種人生選擇時，所表現的，無論是內隱的或是外顯的，都可能是影響或造成士紳的行為模式。唯存在其間的關聯，是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為免治絲益棼，擇其中的傳統家族背景及地方控管機制兩大方向，並立基於前人的研究基礎，以探究清代的變局中地方士紳權威勢力形成的深層因素乃至其影響。

一、文化的家族背景

根據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及《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等，都曾就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源有家族本位的傾向，若與西方社會學家所謂的「家庭主義」相較，頗有相符的特質，即強烈的一體感；嗣續繁衍；恪遵祖訓；家庭公有及重視家庭榮譽等五大特質。唯中國文化與西方異質文化相較，儘管五大特質表象相同，但實質內涵上，中國文化中的家族背景，其特質，乃致由此涵育的中國人，尤其是士人，確實是有其獨特的殊異點。今僅側重士紳的養成簡要析論。

一般的中國家族首以親親的原則，增強成員之間的一體之感，並落實在家

規、族制的設置，而在生活上家族群體之間，產生凝聚、團結的作用外，更置有家譜，以代表對祖先崇拜，而儀式化的祖先崇拜，既富有團結家族的功能，也培養了家族每一分子的歸屬感。能進一步的使成員生命與祖先之間，有縱向的聯繫，並透過教孝傳統，而建立孝悌為最高道德價值的認知與表現，以此奠定、維持家族及奉行事親的倫理價值。由於恪遵祖訓，培養對祖先的認同，有維繫家聲、慧命相續的目的，自然能重視家庭榮譽、追求家族的和諧，而從中也培養了個人的榮譽感。只是此種為維持家族門風、和諧及家聲為職志的前提下，個人志趣、榮譽、自由乃至婚姻是難以自主，甚或是被犧牲的。

是故，中國傳統家族，是以情感的紐帶緊緊每個成員，也無怪乎韋政通謂之是一套嚴密的文化設計，⁸把個人早期對所生家庭的感情，予以特別強調，並與特殊的價值觀念相結合，使其經久長存，不僅強化了人際的情感反應而且還把它制度化了。其間所說的制度化，也就包括：一個家族的成員，如缺乏這方面的反應，將被視為不忠於家族的行為。家族成員之間的感情，愈能熱切的交流，就愈能和衷共濟，也愈代表興旺和諧的象徵，同時，這樣的家族便成為社會讚美和羨慕的對象。

綜前析論，經由嚴密文化設計之下的家族背景，所教養成的個人，期許建立孝悌的道德價值觀、事親的倫理觀；擁有家族的歸屬感和個人的榮譽感，以及追求族親的團結、和諧。然而，也由於重視家族情感，相對的，就輕忽個人志趣、榮譽；因維持門風、家聲、和諧而致個人的斂抑及不自主。為此也形成獨特傳統價值的框架，即不太重視是非觀念（韋政通 2002，55），若為維護親情竟可以犧牲是非，因為爭是非適足以阻斷人際的情感反應。

二、成長的社會化

個人自幼成長是必經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學家稱從兒童到成為社會人的過程，即為社會化。根據研究者指陳的社會化功能有五方面：(1)是扮演社會角色，這是指能否適當、成功地扮演所在社會的各種角色；(2)是規範內化，即要學習社會規範（行為標準），而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唯其如此，一切社會控制的措施才足以發揮其效能；(3)養成基本的生活習慣；(4)則是認識自己、評價自己，以形成自我意識；(5)形成人格，其中形成人格的這項功能，是個人經由社會化

⁸ 關於文化設計，學者在比較研究中、西家庭時，特指陳中國傳統家庭，符合西方社會學家所說「家庭主義」的特質，並以中國傳統家庭為例，是透過親親、孝悌的原則，並在親族關係網絡中，以情感為紐帶，而建立特殊的價值觀念，使其對家族感情長存的文化設施（韋政通 2002，49）。

過程中最關鍵的要項，而完整的人格當具備三方面的性格：即人類共有的本性；民族文化形成的中國人的特性及個人的獨特性。若此三方面的性格都獲得平衡、健全的發展，較能形成完整的人格（韋政通 2002，58）。

唯受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過程影響，從孔孟到秦漢將家族孝道的倡行，推擴到政治、社會而成為倫理教化的綱常，使其既可維持家族和平又可鞏固社會、政治，而成為對廣大臣民產生實際的規範作用。至此事親孝道的“孝”即與事君臣道的“忠”，相混同之下，孝道思想的發展，經聖賢的倡導孝悌傳家、治國，乃至唐、宋以降，更將孝道納入法律的範圍（韋政通 2002，118），終將孝道完全制度化。而孝道的制度化完成，也標誌著家族孝道內化為道德的自律之外，同時孝道也成外顯規範的他律。另一方面，家族孝道對個人教養、成長而言，就已有其權威，但再經制度化後孝道的權威，不僅控制人們的意識層，甚至深入到潛意識層。是故，生活在中國傳統裡，一個人能順從，不僅足以自保、自利，且代表最高美德，因此中國人權威性格的反應，似乎是早經養成自動化的習慣，國民性中權威性格的傾向也就其來有自了。

根據學者進一步研究指陳，權威性格中有理性的、傳統的及神聖英雄人物的權威等三種基本類型（韋政通 2002，110）。至於權威性格的特徵中，尤以不加批評地服從權威及認同權力人物兩項，在中國人的性格上表現的最為明顯（韋政通 2002，125）。就前者而言，對君、父、夫視為絕對服從的權威、對「帝繫」、「王制」、「經學」、「道統」皆分別視為種族、政治、學術、倫理的權威，而不加批評地服從。再就後者而言，認同權力人物，是除對權力人物懷有欣慕之情之外，還可以順著一定的階梯，使自己也能變成權力人物。在中國傳統四民社會的結構裡，也存有國民權威性格的投射展現，那就是代表身份高下的社會階層：皇帝、皇族居於社會最高層，其次官宦儒吏層系，再次為士紳、地主、農民、工商和其他等，而階層高低又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士紳地主與儒吏官宦的關係只是在朝、在野之分，農民其他行業有較多機會上爬晉升。此種以權力為衡而安排的社會階層，即充分說明中國傳統對權力人物的強烈認同。俗諺中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佳寫照。

三、入仕的官宦升晉

（一）士紳的地位角色與社會期待

讀書人至上、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價值取向，在科舉制度的施行導引下，士紳的身份具有的雙重性（王先明 2000，8）：即「士」為讀書的功名者；「仕」則是為官或準備為官者。士子們經由讀書、應試取得功名而進入官宦之途，已成為

人生唯一的取向。相對於其他平民而言，士紳階層是經科舉精選出的社會群體，是來自極為有限的功名、身份，功名愈高，人數愈少，士少則貴。士紳既是封建官僚體系及國家機器的社會基礎，同時又因其功名、身份而與官僚體系緊密結合，而這就成為四民之首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時，這也就是士紳地位獨特的原因之一。

其次，由於士紳地位的獨特，其角色扮演隨之也有被賦予的社會期待，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每種身份、地位，都有被期待的行為模式、義務及責任或特權，同時，也會受文化背景的影響，而作為社會規範的具體內容，於是為特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確定了具體的行為界限，這即是「社會角色」。對士紳階層而言，被期待的「社會角色」，就是要負起穩定社會秩序為首務（王先明 2000，10），所謂士紳望重一鄉，形端乃能表正，這是對士紳的正向期待。所以，皇帝朝廷期待士紳的是不干預公事、不把持官府，如此對上則可以濟國家法令之所不及，對下可以輔官長思慮之所未周。唯社會生活是多變的、呆板律法及帝王命令也有形同具文之時，又豈能框束變動不定的社會生活？清中葉以後，士紳階層已發展成社會基層的控制系統中，最主要的群體勢力，而士紳的地位角色，已遠非王朝期待的社會角色，甚而背離基層秩序的維護、鄉民道德理想的表率等百姓的期待；竟然成了社會腐化的亂源，及人民生活苦痛的肇因。

（二）地方管控機制與士紳權威勢力

就清代地方管控機制而言，原有官方及民間兩大社會控制系統，以達治理地方及維持基層秩序的管控目的。官方的系統以保甲、里甲的制度組織（王先明 2000，29），施用正式的法定權力以執行地方事務；民間的系統則是多樣化的形式如鄉約、宗族、鄉社等，其中尤以士紳階層，既有文化教養又有家族社會中的獨特權威地位，而以非法定權力的社會權威，成為地方權力的實際代表，他的權威勢力的擁有，雖非來自皇權的欽命，但卻是來自基層社會對士紳的角色期待，形同得到社會認可的自然權威，而參與封建政權對地方管控的運作，這是士紳地方權力由來的原因之一；其次封建統治運行中，官民之間等級制度的鴻溝，民情難以直達官府，官府辦事也無從直接施諸於民，必藉助士紳的社會力量，以為溝通官民的渠道或媒介，是故地方官要興利除弊，常先拜訪鄉紳，此為士紳地方勢力由來的原因之二；再次，朝廷為防杜地方胥吏的欺矇，而設有地方官制的迴避、遷調及頻換的措施，常因地方官吏任期短而致生對地方政情、民情的生疏、隔閡。為此，地方官吏勢必借助士紳力量，此為原因之三。

歸納言之，清代地方治理的管控系統，除士紳扮演的社會角色而在社會期待、認可下自然擁有的權威勢力之外，另有因為制度性的兩大原因：即官民等級的鴻溝及官制防弊的頻換等，便造成地方官吏必須借重士紳力量，以達官、紳、

民共同維護地方秩序的現實情勢。而此種地方治理的事實趨向，不僅使得士紳地位、權勢益顯重要，更因地方官吏治民功能弱化，相對的也就強化了士紳控制基層的功能及權力。因此，在清季變局下，朝廷全面傾頹的衰敗過程中，地方治理管控的現實狀況，則是士紳權威勢力的張揚，也在紳權的勃興下，他們不只干預公事、把持政務，甚至發展成與官府牴牾的勢力，並反客為主的居然使許多地方官僅淪為士紳的「監印」，而無法直接插手地方公務的窘境。

無怪乎，有識者論及：「自寇亂以來，地方公事，官不離紳士而有為」（王先明 2000，11），確實反映了地方官場的真相，而前文引述清代小說《紅樓夢》、《淞濱瑣話·因循島》乃至《官場現形記》等文學作品的部分內容，情節不論是賈雨村的應天府履職斷案、項某漂流因循島簡鄉所見狼官貪狠陋行，甚至「官場現形」的種種敗德醜態，皆不過是文學小說家，以諷諭的手法反映官紳的沆瀣一氣，挾其望重一鄉的權威勢力，卻背棄教化的道德理想，甘為貪腐的鷹犬爪牙，助長百姓的病脊可憐之外，更遑論是否契符社會對士紳的地位及角色期待，無庸置疑的，清季士紳的權勢從某方面而言，更是從大清皇朝內部，社會基層、礎石的蛀蝕與腐朽。

伍、結語

《文心·時序》：「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李曰剛 1982，2122），是南北朝劉勰細查歷代文學發展的趨向後，所提出的總結評論，意指作品風格之演變，是受社會情勢而移易，文運之盛衰，亦必與時代嬗變相關。此理証諸清季變局的文學園地，有譴責、諷刺類小說盛興的文學現象，勢必與其世情、時序相關；醒覺識變之士，一本多難興邦之志，在西學新知的開慧啟智下，實踐經世濟民、著論立言之理想，表現出傳統士紳望重一鄉、社會典範的人生上傾。但本文藉小說呈現批判、諷刺、反映當時官場文化及士紳劣行的事實，以凸顯出部分士紳背離理想的人生沈淪，而側重其肇因的索解。

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孝被視為最有生活實踐的意義，而孝道是中國人家族、社會、宗教乃至政治生活的根據，所以孝道可謂是中國的國本、國粹。因此從士紳養成、孕育的文化考察中，經家族背景、成長社會化至進入宦途的過程，或可觸及影響型塑士紳的相關可能因素。

由於受到以親情為紐帶的孝道文化系統的涵化下，容易傾向重情感不重是非、斂抑不自主、人格不夠完整；權威性格的負面傾向，形成較易自保、自利的服從權威、認同權威等，這些內隱的成分，似乎已積澱在士紳的意識深處。尤其在清季地方治理管控制度方面，由於先天官、民隔閡、防杜胥吏欺瞞的輪調、頻

換，形成地方管控失效、失能的背景，更助長士紳勢位高漲的時趨。而隱含在意識深處的內心幽暗成分，受外在環境的誘發下，擊倒內在自我省覺檢束的自律規範力量。畢竟道德實踐是個人理想的追求，並無制裁、強制的作用，儘管有朝綱制度、律法皇令框束的他律系統，但在社會生活多變之下，也很難不失能、不失效的。清季部分士紳在位尊勢強的局面，其陋行劣跡，在諷刺小說所反映的，只是時代問題的一隅，但已是違犯社會期待，更是蠹蝕國礎，所謂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也確實如史家所言，運涉季世，「人未盡才」，可為嘆息！

參考書目

- 王俊義、王愛平。1999。《清代文化學術史論》。台北：文津出版社。
- 王先明。2000。《中國近代文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爾敏。1995。〈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行龍。1998。〈人口 家庭 宗族〉。《中國近代社會史》。喬志強主編。台北：南天書局。
- 朱敬武。1996。《章學誠的歷史文化哲學》。台北：文津出版社。
- 李仁淵。2008。〈晚清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江南為例〉。引自思與文網 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6043.htm。2008/09/23。
- 李伯元。1984。《官場現形記》。台北：三民書局。
- 李伯元。1984。《文明小史》。台北：三民書局。
- 余英時。1992。《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台北：聯經出版社。
- 何秀煌。1991。《思想方法導論》。台北：三民書局。
- 牟宗三。1984。《歷史哲學》。台北：學生書局。
- 牟宗三。1983。《中國文化的省察》。台北：聯經出版社。
- 李曰剛。1982。《文心雕龍輯註（下篇）》。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杜正勝。2005。〈傳統家族試論〉。《家族與社會》。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林安培。1995。《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史論》。台北：學生書局。
- 胡楚生。1994。《清代學術史研究續篇》。台北：學生書局。
- 徐亞萍。2007。〈清季知識份子的通變歷史觀〉。「中國傳統學術之傳承與拓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徐亞萍。2004。〈清季知識份子「應變」的群體意識與「運會」觀念〉。「中國傳統學術之傳承與拓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徐復觀等。1980。《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
- 徐復觀。1959。《中國思想史論集》。台北：學生書局。
- 孫燕京。2004。《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
- 時萌。1993。《晚清小說》。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2001。《清代學術論叢》第一輯。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 曹雪芹。2009。《紅樓夢》。台北：三民書局。
- 常建華。2006。《清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書錄。2007。《儒商及文化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
- 陳文彬。1999。〈析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來瀘紳商社會觀念的嬗變〉。《史學月刊》1999年第2期。引自中華文史網 www.historychina.net/tws/index.html。2007/07/09。
- 郭英德。2006。《中國四大名著講演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郭正昭、王樹槐、林載爵、呂芳上。1999。《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吳敬恆》。台北：商務印書館。
- 韋政通。2002。《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台北：水牛出版社。
- 梁啟超。1994。《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
- 賀跋夫。1993。〈晚清士紳與中國的近代化〉。《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3期。引自 www.fass.net.cn/hassnews/erji01.asp?NewsID=3513。2009/07/23。
- 張玉法。1989。《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
- 張素貞校訂。1984。《中國古典名著 官場現形記》。台北：三民書局。
- 賴芳伶。1994。《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台北：大安出版社。
- 錢穆。1980。《中國學術思想史叢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鍾越娜。1977。《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吏造型》。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 遲雲飛。2003。〈清代社會的裂變與各階層分析—兼論清王朝的覆亡〉。《史學集刊》2003年第4期。
- 羅志田。2005。〈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份子的興起〉。引自學術中華網 www.xschina.org/show.php?id=2966。2005/02/21。
- 羅志田。1998。《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龔自珍。1975。《龔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 〈西方史學界的明清“紳士論”〉。《清史研究》2007年2月號。引自學術中華網 www.xschina.org/show.php?id=12137。2008/04/16。

(投稿日期：98年12月16日；採用日期：99年1月15日)